

# 丁酉再乱与明朝的应对战略\*\*

郑洁西\*\*\*

前言

一、从“继续外交”到“出兵应援”：册封失败后的战略更张

二、从“外交观望”到“一意进剿”：再战前后的实际应对

三、战争后期的进剿受挫与明朝的战略动摇

结语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16世纪后期东亚局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日本丰臣政权侵略朝鲜而引发的东亚国际战争（1592-1598）。这场战争虽历时长达七年之久，但并非一直处于交战状况，期间有过两次战和转换。万历二十一年（1593）开始的外谈判判是“由战而和”的第一次战和转换，册封丰臣秀吉失败后发生的再战则是“由和而战”的第二次战和转换。再战期即丁酉再乱期（1597-1598）明朝的应对战略并非简单划一而是在一直不断变化。册封丰臣秀吉失败后，明朝最初的应对战略是“继续外交”，但随后的日军登陆釜山军事行动触碰了明朝的底线，明朝很快将应对战略调整为“出兵应援”。但明

\* 本论文在2019庆北国立大学人文国际学术周国际会议（11.6.-8）上发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万历朝鲜战争外交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CZ S009）的阶段性成果。

\*\*\*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teiketsusai@163.com

朝在当时保留“外交观望”态度，认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半岛冲突问题，其调兵规模和调兵速度均较克制，试图以有限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胁迫日军在外交上做出让步。随着战争的再次爆发，明朝重新调整应对战略，完全放弃外交手段，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一意进剿”战略。战争后期的进剿受挫虽然对明朝的既定战略有所动摇，但明朝最终仍然以该战略终结了这场战争。

**【关键词】**

丁酉再乱 应对战略 出兵应援 外交观望 一意进剿

## 前言

16世纪后期东亚局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日本丰臣政权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战争（1592-1598）。该战争在中国一般统称“万历朝鲜战争”，在韩国一般将之分称“壬辰倭乱”、“丁酉再乱”，在日本则多称“文禄、庆长之役”，近年则出现了统合三国的“壬辰战争”之称。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除了被害方朝鲜和加害方日本，还有与朝鲜保持了两百余年友好关系的中原王朝明朝。

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以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侵朝日军登陆釜山为开始，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军在明、朝两国联军的联合打击下全线撤军回国为结束，历时长达七年之久。但这七年并未完全处于交战状况，期间有过两次战和转换。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明朝联军夺回平壤后不久，退到王京（今首尔）的日军主动提出了和平交涉请求，双方于是开展了为期四年之久的外交交涉（1593-1597），此为“由战而和”的第一次战和转换。接下来的外交交涉以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举行的明朝使节团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大坂城册封典礼为一个重要结点，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丰臣秀吉借口朝鲜不派王子入贺册封大典而拒绝撤回驻朝日军，并于次年继续派兵入侵朝鲜引发第二阶段的战争即丁酉再乱，使得东亚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此为“由和而战”的第二次战和转换。

关于第二阶段战争的丁酉再乱，学界已有不少先行研究，如德富猪一郎的《近代日本國民史 豊臣氏時代 朝鮮役》（民友社，1921-1922）、日本参谋本部的《日本戰史 朝鮮役》（偕行社，1924）、李焯锡的《壬辰倭亂史》（东洋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77）、郑樑生的《明日關係史の研究》（雄山阁，1985）等著作叙述包括丁酉再乱在内的整个战争过程颇为详悉，另有中野等的《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吉川弘文馆，2006）利用丰臣秀吉的军令文书，对丁酉再乱期的日方战略有所考述。陈尚胜的《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则考察了丁酉战争爆发后明朝做出的再次援朝御倭决策及其军事战略安排，着重考察了个案南原之战的败因及其对明朝战略调整的影响，认为南原之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明军在战略安排上的冒进与战略保障上的缺乏，以及明朝援军决策者

和朝鲜君臣所存在的急躁与轻敌心理。卜永坚的《十六世紀朝鮮戰爭所反映的明朝政治生態——以柳思瑗《文興君控于錄》為中心》（《第二届壬辰战争研究工作坊论文集》，山东大学，2018年4月）一文则以朝天使柳思瑗的《文兴君控于录》为基本史料，探讨了丁酉再乱前夕明朝的外交理念与运作、科道官的议政空间、各行动者操弄资讯的办法等课题，借以把握十六世纪明朝的政治生态。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对明朝的战略应对情况尚无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对明朝应对战略的认识也较为简单划一。拙稿将全面考察整个丁酉再乱期明朝在各个阶段的应对战略及其变迁情况。

## 一、从“继续外交”到“出兵应援”：册封失败后的战略更张

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的大坂城册封典礼上，丰臣秀吉表面上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实际上却借口朝鲜不派王子入贺拒绝撤回釜山驻军。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北京获悉的消息在时间上要滞后不少。

册封情况的最初消息由辽东总兵董一元传入北京，其传入时间在当年（1596）十一月十二日，距册封结束已有两个多月之久，其内容是“矣白已于九月初一日受封”<sup>3)</sup>，并无更多细节。其后的十二月初，北京收到的关于册封情况的第二份消息与前一份消息大相径庭，其源头则来自于朝鲜国王写给蓟辽总督孙鏞（兼经略朝鲜军务）的外交咨文：

蓟辽总督孙鏞奏：朝鲜国王咨称矣白因朝鲜不遣王子致谢，复欲兴兵，清正等今冬过海，大兵明年调进，乞要先调浙兵驻扎要害以为声援。章下兵部。<sup>4)</sup>

孙鏞将朝鲜国王关于册封并不成功、担心日方再犯朝鲜的外交咨文向明神宗做了转奏。鉴于日方有再侵朝鲜的企图，孙鏞认为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3) 《明神宗实录》卷304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一月甲辰（十二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699页。

4) 《明神宗实录》卷305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丙寅（初四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06页。

较大，建议调用浙兵入朝驻扎先行防守。

朝鲜国王的担心和孙鏞的建议在最初并没有得到明朝朝廷的认可。当时明朝朝廷内部的主战、主和两派关于册封是否失败、是否需要调兵入朝存在较大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日方所强调的朝鲜“不遣王子致谢”所产生的后续问题。朝鲜国王和以孙鏞为代表的明朝主战派官员认为日方索求王子不成必然会调兵再犯朝鲜，必须尽早预作准备，而册封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和负责统筹对日外交的兵部尚书石星等人则认为日本虽对朝鲜的外交作为有所不满，但仍然愿意听从明朝的调停，所以很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要求朝鲜自行隄备，明朝不可能再以武力相援。兵部在日本索求王子问题上与主战派的观点基本一致，主张朝方“王子必不可遣”，日方“王子必不当索”<sup>5)</sup>，并不曾有过朝鲜国王所担心的“天朝必令遣大臣、王子”<sup>6)</sup>这一妥协意向，其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所确定的是一套朝鲜所能接受的折衷方案：

行文与日本国王撤还釜兵以全大信，又行文与朝鲜国王即差陪臣以修交好，谢恩表文还令日本使臣同杨方亨先来复命，沈惟敬待两国事完回还。<sup>7)</sup>

事实上，当时主和派对明朝的战略决策影响更大。因为日本索求王子不成必将再犯朝鲜在当时仅仅停留于传闻，并未发生实际军事行动，主和派的有力支持者是内阁首辅赵志皋，在朝中实际掌权，所以其论调暂时占据上风，石星的奏请也顺利地获得了明神宗的裁可。明神宗授意兵部出面“继续外交”协调朝日双方关系，并移咨日朝双方，要求日方撤回釜山驻军，而作为交换条件，朝鲜方面则需派遣陪臣赴日与之修好。明朝的协调方案一方面适当照顾丰臣秀吉的颜面，一方面则切实考虑了朝鲜方面的实际利益，貌似合乎时宜。

但该方案在一个月后就被现实所推翻。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初，

5) 《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丙申（初五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22页。

6) 《宣祖實錄（第三）》卷84宣祖三十年（1597）正月甲寅（二十三日）条，《李朝實錄》第廿九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10页。

7) 《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丙申（初五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22页。

日将加藤清正率部于正月月中旬驾船二百余艘登陆朝鲜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在京活动的朝鲜使臣郑期远等人“痛哭求援”，明朝的科道官则大肆渲染朝鲜的紧急“战况”，结果很快引发了讨论朝鲜局势的九卿科道会议<sup>8)</sup>。此次会议在二月初九日召开，对明朝的对日战略调整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的详细情况见录于辽东都司发给朝鲜方面的外交咨文《都司咨会九卿科道会议东征》中。因兵部尚书石星避嫌不准与会，会议由兵部左侍郎李祯主持，参会者有吏部左侍郎孙继皋、户部尚书杨俊民、礼部尚书范谦、刑部尚书萧大亨、工部署掌部事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养蒙、通政使司使田蕙、大理寺右少卿白栋、太常寺卿范仑等人以及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在廷议上，原定的“继续外交”方案被否决，几乎所有参会者都持主战意见，一致建议朝廷对朝鲜“出兵应援”。<sup>9)</sup>李祯在次日领衔的会题奏稿中提出了具体的调兵、运饷、设官、作战方案。其中的援兵调发方案为：

责令宣大挑选精兵二千名，蓟镇挑选南兵二千名，辽东除宽奠新募兵一千二百名，另挑一千八百名，其应募浙兵三千七百八十五员名，令督臣孙即于本镇随便酌量募用，不必另委浙江募发以滋劳费，应调水兵速行各该省直陆续调发。<sup>10)</sup>

提议向朝鲜调发宣大、蓟镇、辽东、浙江等处陆兵10785名以及省直（主要为浙江、直隶两地）水兵以对抗侵朝日军。

明朝这一从由“继续外交”到“出兵应援”的战略更张，与日本挑战明朝原定的“三事之约”有关。明朝与日本之间原来有“釜山倭众尽数退归”、“一封之外，不许别求贡市”、“修好朝鲜，共为属国，不得轻肆侵犯”的“三事之约”<sup>11)</sup>，其中第一条“釜山倭众尽数退归”指得是集结于釜山的日军全部撤回

8) 《明神宗实录》卷307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丙寅（初五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32-5733页。

9) 《事大文軌》卷21《都司咨會九卿科道會議東征（萬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韩明基、李相薰共编《壬辰倭亂史料叢書3 對明外交》所收，晋州博物馆，2002年，第3-64页。

10) 《事大文軌》卷21《都司咨會九卿科道會議東征（萬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韩明基、李相薰共编《壬辰倭亂史料叢書3 對明外交》所收，晋州博物馆，2002年，第58页。

日本后明朝册封使方可渡过鸭绿江经由朝鲜赴日举行册封大典，但明朝在整个外交过程中一直有所退让，结果最终变为日军大部分撤军后册封使即渡航日本举行册封大典，册封活动结束后驻扎釜山的日军余众“尽数退归”。但是，在册封大典结束后，日方仍然拒不撤兵。虽然如此，明朝却仍然有意在外交上适当退让，以协调朝日关系换取日方的最终全部撤兵。但日方在驻军问题上却不撤反增，其悍然以武力相威胁的强势态度无疑挑战了明朝的外交底线，引起了大多数朝臣的反感。故而在此次九卿科道会议中，与会者多持主战意见，主和派失去支持<sup>12)</sup>，明神宗在李祯上奏次日即下旨宣布正式调整对日战略方针，决定以武力再援朝鲜<sup>13)</sup>。

## 二、从“外交观望”到“一意进剿”：再战前后的实际应对

明朝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十一日确定军事援助战略到战争再次爆发的七月份，期间有五个月时间的作战准备期，时间尚算充裕，但实际上在战争前夕派到朝鲜战场的明朝军队却为数不多，南下逼临日军的明军仅有驻守南原的杨元辽兵三千人、驻守忠州的吴惟忠薊镇南兵近四千人 and 驻守全州的陈愚衷延绥兵两千人共近九千人，此外全部入朝明军也仅有一万两千余人。

明朝既然早已定议应援朝鲜，为何不但其调兵规模不大，且其在实际的调兵行动上也如此迟缓？这恐怕和明朝当时的“外交观望”态度有关。

如上所述，兵部左侍郎李祯在二月初十日的会题稿中提议向朝鲜调发宣

---

11)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后附《兵部等衙门题为仰奉明旨以定东封事》，吴丰培主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200-1201页。

12) 《事大文軌》卷21《都司咨會九卿科道會議東征（萬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韩明基、李相薰共编《壬辰倭亂史料叢書3 對明外交》所收，晋州博物馆，2002年，第3-64页。

13) 《明神宗实录》卷307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壬申（十一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36-5737页。

大、蓟镇、辽东、浙江等处陆兵10785名以及省直水兵，但该调兵计划在实际执行时却有所调整。李祜的提议虽然得到了明神宗裁可，但其需要协同蓟辽总督确定最终的实际执行方案。当时的蓟辽总督孙鏞对此调兵计划的执行方案作出了如下调整：

原议调发蓟镇南兵二千名，但部伍不敷，难以远发，议照先年戚继光伍法，共选三千七百八十五员名，以原任副总兵吴惟忠领之，原议辽兵三千名，今议再加挑选，以原任副将杨元领之，辽海参政杨镐监督二将，刻期前往以救朝鲜。<sup>14)</sup>

李祜题奏、明神宗裁准的调发宣大、蓟镇、辽东、浙江等处10785名陆兵以及省直水兵调兵方案，孙鏞在实际操作时仅安排了蓟镇南兵以及辽兵共6785人的调兵方案，其对宣大、浙兵以及水兵并未涉及。<sup>15)</sup>其在后来虽然又追加了水兵、浙兵调兵方案，但其所议调的浙江、直隶水兵3593名（以游击季金统领）预定驻扎在旅顺口，新募浙兵3785名（以游击陈蚕统领）则预定驻扎鸭绿江西岸，均计划驻扎在中国境内而并不直接进入朝鲜。<sup>16)</sup>

明朝最初不直接将大量援军迅速调往朝鲜，既受制于明朝的兵力和财力、运力，也和明朝当时的“外交观望”态度不无关系。日本虽持续向朝鲜增兵，但并不主动发动攻势，其对明朝在表面上尚持尊奉态度，其在外交上则坚持继续谋求与明、朝双方进行斡旋，这使得明朝朝廷上出现了幻想继续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事态的“外交观望”态度，不少朝臣认为仍有可能用外交解决半岛冲突问题。原本积极主战的孙鏞在执行调兵计划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朝内这种“外交观望”态度的影响。对于入朝明军，孙鏞建议朝廷责令其不得轻举妄动，时刻关注日军动向，日军主动“掠动朝鲜郡邑”后马上向上级“速行驰报”，然后明朝的“水陆大兵”方可“次第进发”。<sup>17)</sup>事实上，明朝当时所调兵

14) 《明神宗实录》卷307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戊寅（十七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744页。

15) 孙如洵辑《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刻本）卷2《蓟辽奏疏·紧急倭情疏（一）》。

16) 孙如洵辑《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刻本）卷2《蓟辽奏疏·紧急倭情疏（二）》。

17) 孙如洵辑《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刻本）卷2《蓟辽奏疏·

力极其有限，根本没有能力将釜山日军驱迫回国，其当时的发兵初衷，也并非直接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而是以有限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军主动撤兵。可见，此时的明朝朝廷虽然确定了应援朝鲜的战略方针，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外交交涉。对于仍然在前线与日方进行外交斡旋的原册封副使沈惟敬，虽然其在册封丰臣秀吉的外交活动中并未取得成功，在明朝朝廷上也屡遭弹劾，但朝廷并未对之采取惩治措施，孙鏞在上奏中也建议明神宗继续将之留在朝鲜对日交涉：

游击沈惟敬方奉旨调戡两国，合仍行责成，如兵到而釜山倭兵尽数退去，仍准以封事完结论功，即兵到而倭兵尚未抢掠，亦准酌量议叙。此乃目今救援急务。<sup>18)</sup>

孙鏞建议留用沈惟敬，责成其继续调戡朝日两国外交关系，并以明军南下作为其军事后盾，以军事力量辅助外交，诱使釜山日军全部撤退回国，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有可能制衡日军不使其发动“抢掠”朝鲜的军事侵略行为。明朝朝廷认同了孙鏞的建议，后来由兵部发给沈惟敬的箭付《兵部为紧急倭情事》也重申了这一点：

沈惟敬往来日本，熟知倭情，原奉明旨调戡两国，应照督臣所议，仍行责成，一应主持运用，悉听督抚相机处置，未尽事宜，应经行者经行，应奏请者奏请，致在仰体皇上东顾之忧，共图保安属国之绩。<sup>19)</sup>

可见，明朝虽然在当年二月就做出了应援朝鲜的战略更张，但鉴于驻朝日军并未发动攻势，朝鲜局势仍然稳定，其继续以“外交观望”态度把控援朝明军的调兵规模和调兵速度，实际上的战略实施方案是“外交观望”，试图以有限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胁迫日军在外交上做出让步。

孙鏞在当年三月十九日因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遭到革职处分，继任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的邢玠某种程度上仍然沿袭了孙鏞的实际执行方案。

---

紧急倭情疏（一）》。

18) 孙如洵辑《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刻本）卷2《蓟辽奏疏·紧急倭情疏（一）》。

19) 《宣祖實錄（第三）》卷86宣祖三十年（1597）三月己酉（十九日）条，《李朝實錄》第廿九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40页。

在调兵入朝方面，邢玠主持的调兵规模虽然较孙鏞有所扩大，但幅度变动不大，而调兵速度也仍然缓慢。如直到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实际安排调发的援朝明军为副总兵杨元统领的辽兵三千，吴惟忠统领的蓟镇南兵三千九百余名，总兵官麻贵统领的宣大兵一千余名，游击牛伯英统领的密云右营、遵化左营共兵两千名，游击陈愚衷统领的延绥入卫兵两千名，密云道选练的南兵二千，共计仅一万三千余。其中在当时已经渡过鸭绿江的仅杨元所部辽兵，已过山海关的仅吴惟忠所部蓟镇南兵，其他各枝援朝明军的行动相对缓慢。20)到当年六月中旬，实际安排调发的援朝明军总兵额虽然增加到了三万八千余人，21)但至当年七月初正式开战前夕，包括先行入朝的杨元、吴惟忠两部在内的全部援朝明军也仅有一万二千兵力到达朝鲜。22)在外交方面，邢玠虽然声称不满于沈惟敬的作为一直想尽早将之拘执归案，但迫于朝廷内主和势力的压力而投鼠忌器，也持“外交观望”态度，担心过早拘捕沈惟敬使得“垂成”的外交斡旋失败而遭到主和派的“坏封事之谤”，继续留用沈惟敬与日方交涉，直到当年六月底外交斡旋完全失败后方始将之拘执归案。23)

沈惟敬遭到拘执以后，日军在当年七月再次发动攻势，是为丁酉再乱。丁酉再乱的发生，宣告明朝“外交观望”应对战略的彻底失败，而接下来在八月中旬发生的南原城之战更对整个明朝朝野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南原系朝鲜全罗道交通要塞，该城在当时由明朝副总兵杨元所部辽兵镇守，但在日军的优势兵力围攻下五日之内即告陷落，三千辽兵中阵亡两千七百余人，几近全军覆没。24)南原城之战的惨败对明朝朝廷的刺激较大，促使其放弃“外交

---

20) 《事大文軌》卷20《邢軍門催送將領軍兵(万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韩明基、李相薰共编《壬辰倭亂史料叢書3 對明外交》所收，晋州博物馆，2002年，第114-115页。

21) 《明神宗实录》卷311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甲戌(十五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808页。

22)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2《申明进止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75-226页。

23)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2《拘执沈惟敬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5-24页。

24)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2《会参杨元陈愚衷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59-166页。

观望”战略，转而采取积极措施开展大规模的“一意进剿”战略。

为了实施“一意进剿”战略，明朝在还采取了以下两项相关措施。

(一) 战端、战败问责。受战端再起和南原城之战失败的刺激，明朝迅速开展战端、战败运动。被问责的群体有以下三种：一、主和派。对日外交交涉被认定为战端所在，如外交交涉期间倾向和谈、力主册封的兵部尚书石星和册封副使沈惟敬分别在当年九月和十二月被下狱论死；同情沈惟敬、在战事再起后主张继续对日外交的海防使萧应宫则遭遣戍。<sup>25)</sup>二、备战不力者。如天津兵备副使许守恩因备战不力而被遣戍。<sup>26)</sup>三、作战不力者。如失陷南原城的副总兵杨元以及退出全州城避战而不出兵救援南原的游击陈愚衷均遭重处，其中杨元虽然血战突围，但仍以亡失兵马之罪斩首悬边。<sup>27)</sup>战端、战败问责具有惩戒效力，有助于明朝迅速有效地开展“一意进剿”战略。

(二) 在天津设海防重镇。当年九月，应内閣赵志皋、张位、沈一贯三辅臣以及蓟辽总督、援朝经略邢玠的奏请，明神宗以万世德为海防巡抚在天津设镇确保制海权以保明朝海疆安全<sup>28)</sup>。

明朝在之后开展的“一意进剿”战略举措则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大规模调兵入朝。明朝在南原城之战失败后加大调兵规模、加快调兵步骤，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一月的调兵计划骤扩为十万<sup>29)</sup>，是壬辰倭乱期援朝明军规模的两倍多，其中水军调用规模极大，共调发浙江、福

---

25) 萧大亨：《刑部奏议》（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明万历刻本）卷2《会审原任石尚书疏》、《三法司回话疏》、《再审原任石尚书招由疏》、《沈惟敬招由疏》。参见郑洁西、杨向艳：《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3期。

26) 萧大亨：《刑部奏议》（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明万历刻本）卷2《天津许参议被逮招由疏》。

27)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2《会参杨元陈愚衷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59-166页；《明神宗实录》卷314万历二十五年九月乙未（初七日）条、卷25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丙申（十二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870页、第5984-5985页。

28) 《明神宗实录》卷314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初四日）条、九月戊戌（初十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866-5870页、第5871页。

29) 《明神宗实录》卷316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寅（十五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897页。

建、南京、广东共九批两万一千名水军北上参战。<sup>30)</sup>因为明朝在壬辰倭乱期并未有过调发水军举措，由此可见当时的明朝对海战的高度重视态度。

(二) 快速驱兵南下进攻作战。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负责入朝作战指挥的经理杨镐几乎动员了当时的全部在朝明军四万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蔚山攻城战，此役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予敌以重创，对日军整体打击颇大<sup>31)</sup>；次年(1598)九、十月间，明军又以十万兵力与朝军联合作战，同时在朝鲜南部的东、中、西、海四路对日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进攻再次受挫，“四路之师一时溃败”<sup>32)</sup>；明朝联军最终在当年十一月的露梁海战中将日军击溃。<sup>33)</sup>

(三) 规划征讨日本本土战略。明廷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采纳福建巡按徐兆魁的提案，正式决定征讨日本本土，其计划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主体组织舰队直捣日本，并决定在浙江重点开展这项战略，将广西总兵童元镇改调浙江作为明朝远征军的主帅。除此之外，明朝打算在实施该战略过程中联合日本国内反对丰臣政权的地方大名、在日明人、近洋各国势力和往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商人四股力量，增加跨国远洋作战的胜算。<sup>34)</sup>该战略无疑是最为严厉的对日打击手段，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马上停行，可见明朝并没有吞并日本的战略意向，其目的仅仅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东亚海域的日本(倭寇)问题，最大程度上确保其自身及其盟友的国际安全。

据上可见，明朝虽然早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就确定了出兵应援

---

30) 《明神宗实录》卷314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庚子(十二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871-5872页。

31)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4《乌山撤兵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95-209页。

32)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引赵志皋：《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0页。

33) 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6《奏辩东征始末疏》，《御倭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70-131页。

34) 《明神宗实录》卷318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己亥(十三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922页。刘元霖：《抚浙奏疏》卷12《议留总戎疏》，日本东洋文库藏明万历刻本。

朝鲜的战略方针，但因朝鲜局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稳定，明朝在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是以“外交观望”态度应对局面，其试图以相当有限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胁迫日军在外交上做出让步。但随着战争的再次爆发和明军初战的失利，明朝重新调整战略，完全放弃外交手段，开始实施了更加积极的“一意进剿”战略。

### 三、战争后期的进剿受挫与明朝的战略动摇

经理杨镐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底和次年（1598）年初组织了蔚山攻城战，但却先胜后败。此次进攻作战的失利无疑使援朝明军遭受重大挫折，此后发生的丁应泰诬告事件影响了援朝明军的军事行动<sup>35)</sup>，朝中的主和派也曾一度借题发挥试图调整对日战略，但其最终并未成功。

蔚山战后，援朝明军决策层急于再战，重新规划实施了打击日军的东、中、西、海路的“四路围攻”战略。但在当年十月的围攻战中，“中路以被诱大败”，“东西两路亦以攻城损伤”，海路的“陈璘兵船”又被“焚掠”，“四路之师一时溃败”。<sup>36)</sup>该消息对明朝朝廷打击甚大，原本就持主和态度的内阁首辅赵志皋为此专门向明神宗上奏《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一疏，指出援朝明军原来的“一意进剿”战略“倖倖然以思一逞”，试图“一战以收全功”取得速胜，但此次大败却使得明军锐气阻消，难以再举，而明朝国内则已经“竭四方水陆之运，集远征调之兵，人情汹涌，海内骚然”，再战难能取胜，而兵不可再调，饷不可再运，建议朝廷“图久远之计”，调整对日战略，放弃原先的“一意进剿”战略，采取对日

---

35) 黄修志：《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与“书籍外交”》，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解祥伟《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对明辨诬问题研究——以“丁应泰弹劾朝鲜”事件为中心》，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36)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引赵志皋：《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0页。

守势，撤回大部分援朝明军，只“量留若干”明军分布“全庆要害之处”“坚壁把守”，一面广开屯垦，一面训练朝鲜士兵使其能够“自守”，争取使“倭奴不至如前冲突”，最终寄希望于日军“自图归计”主动撤回。<sup>37)</sup>赵志皋之所以提出如此建议，一方面出于其主和反战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确有不容乐观的国内形势：兵力方面，明朝几乎已经动员了国内的全部精锐，包括蓟兵、辽兵、宣府兵、大同兵、延绥兵等边兵，浙兵、南直兵、福兵、两广兵等有抗倭经验的沿海兵以及川湖兵、南赣兵等内地兵，如若再行征调，所能募集到的皆不过是“柔弱之徒”，于战事并无太大裨益，但各地“连年征发，尺籍空虚”，而“北虏乘机，时挟贡赏”，倘再有内乱，不但不能救朝鲜，自救亦且不暇，故而援兵难以再调；财力方面，援朝之役岁费库银数百余万两，山东、浙直、闽广各地加赋六七十万，加以“旱涝之灾”和“开采之役”，人不堪命，百姓逃窜流离，输饷朝鲜亦难以为继。<sup>38)</sup>明朝国力有限，确实也难以继续实施“一意进剿”战略。

赵志皋的上奏无疑受到了明神宗的重视，其为此特颁圣旨下令筹备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会议商讨朝鲜战略调整事宜。<sup>39)</sup>但次日却传来了一则意想不到的消息：

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报癸酉平秀吉死，内难将作，且与小西行长平素不睦，必自相图。倘水陆夹攻，歼此鲸鲵，或其时也。乞敕朝鲜经督诸臣，再加侦察，相机进剿，以彰天讨，勿为清正狡谋所疑。<sup>40)</sup>

金学曾提供的丰臣秀吉死讯源自琉球方面的外交咨文<sup>41)</sup>，具有较为可靠的

---

37)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引赵志皋：《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页。

38)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引赵志皋：《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0-1611页。

39)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引赵志皋：《东征平定无期国事骚骚可虑恳乞圣明神断并集廷议以图长胜久安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2页。

40) 《明神宗实录》卷328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癸巳（十二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6073页。

凭信度，这一消息的传入无疑及时地为日趋低调的朝议打开了新的局面。金学曾的“水陆夹攻”、“相机进剿”提议，也很快得到了兵科给事中张辅等人的响应，明神宗俯准其议，下令“廷议免行”，敕令援朝明军继续“一意进剿，务收荡平之功”。<sup>42)</sup>

事实上，朝鲜战局在几天之后即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全线从朝鲜撤兵回国，丁酉再乱很快就宣告结束。明朝的进剿受挫一度引发了明朝既定战略的动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国力的虚乏及其应对战略的易变性，但明朝最终仍然以“一意进剿”战略终止了这场战争。<sup>43)</sup>

## 结语

综上，拙稿全面考察了丁酉再乱期明朝在各个阶段的应对战略及其变迁情况。

册封丰臣秀吉失败后，明朝最初的应对战略是主和派提议的“继续外交”方案，但该方案因日军加藤清正部的登陆釜山行动触碰明朝外交底线，很快就在九卿科道会议上遭到否决，明朝随即出台了“出兵应援”应对战略。

但“出兵应援”战略在实施上并不彻底，明朝最初并不直接将大量援军迅速调往朝鲜，而是采取了“外交观望”方案，这既受制于明朝的兵力和财力、运力，也和朝鲜局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稳定有关，明朝因此认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半岛冲突问题，所以其试图以有限军事力量为后盾胁迫日方在外交上做出让步。随着丁酉再乱的爆发，明朝再次变更应对战略，

---

41) 郑洁西：《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95页。

42) 张辅之：《太仆奏议》卷3《朝鲜撤战议守疏》，《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43) 作为明朝朝廷确定的整体对日战略，“一意进剿”虽然有过的动摇，但作为国家战略并未发生改变。不过在战争后期确实发生了局部议和的活动，但这是前线军方的私下活动，并无明朝朝廷的授意。参见杨海英：《毛国科使日考：兼谈万历援朝东征后期的和议问题》，《明史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完全放弃了外交手段，开始实施更为积极的“一意进剿”战略。明朝在此后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进剿，但均告失败。特别是第二次进剿受挫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明朝的既定战略，反映了明朝国力的虚乏及其应对战略的易变性。但明朝最终仍然以“一意进剿”战略终止了这场战争。（本文系由2019年11月6日在韩国庆北大学召开的“变化与应对”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丁酉再乱与明朝的应对》改稿而成。）

※ 이 논문은 2020년 2월 10일에 투고 완료되어  
2020년 2월 17일부터 3월 4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20년 3월 5일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 결정된 논문임.

Abstract

## Japan's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 and Ming Dynasty's Response Strategy

Zheng, Jiexi

The greatest event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in East Asia was the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1592-1598). The war lasted seven years, during which there were two alteration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 which began in 1593 was the first change of the state of war, and the second change occurred after Japan's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1597-1598), before which Toyotomi Hideyoshi, the ruler of Japan, was not quite satisfied with the title of King of Japan conferred by Ming Danasty.

The strategy Ming Dynasty took to meet Japan during Japan's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1597-1598) was not simply consistent but constantly changing. After Toyotomi Hideyoshi was conferred King of Japan, the original response strategy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to continu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ut the subsequent Japanese military landing in Busan touched the bottom line of Ming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soon adjusted the response strategy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send troops to Korea. However, Ming Dynasty maintained diplomatic contacts with Japan to see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for it believed that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y diplomatic means, trying to use military force as a backup force to force Japan to make

diplomatic concessions. With the outbreak of Japan's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1597-1598), Ming Dynasty completely abandoned diplomatic means and adopted attack strategy to defeating Japanese invaders by military forces. Although the setback of the late war destabilized Ming Dynasty's strategy, Ming Dynasty finally ended the war with its attack strategy.

**keywords :**

Japan's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1597-1598), Ming Dynasty's Response Strategy, Military Intervention, Diplomatic Contacts, Attack Strategy